

索菲亚·麦克莱纳
斯尔杰·波波维奇
约瑟夫·赖特
言晓义译

索菲亚·麦克莱纳 (Sophia McClennen) 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国际事务和比较文学教授

斯尔杰·波波维奇 (Srdja Popovic) 是非暴力行动和战略应用中心 (CANVAS) 的创始人，也是科罗拉多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的讲师

约瑟夫·赖特 (Joseph Wright) 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译者言晓义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获台湾梁实秋文学翻译奖

中国民主季刊

第1卷 第4期
2023年10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使非暴力运动更有力量

编按：过去几十年中，民众非暴力运动已经成为通向民主的最可靠路径。然而，并非所有非暴力运动都取得了成功。如何使非暴力运动变得更加锐利、有效？在这篇文章中，三位作者专门探讨了一种他们称之为“致困行动”的战术。他们的研究表明，使用这一战术有助于提升非暴力抗争的成功机率。该文 2023年1月首发于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4, Number 1 January 2023)。

1982年，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期间，波兰东部小镇瑞尼克(Swidnik)的居民决定带着电视机去散步，以此抗议政府的媒体宣传。活动人士旨在表达他们对共产国家一手遮天控制所有媒体的不满，但他们认为鼓励个人进行私下抵制是毫无意义的：毕竟，如果你坐在家中客厅里不看新闻，谁会知道呢？但如果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这种抵制公开可见呢？如果把对政府宣传和举国信息控制的不满明白无误地公之于众呢？

最终，活动人士决定在重要的晚间新闻播出时段，将他们的电视机带到街上，用手推车“遛”，就像是推婴儿车一样。不久之后，在这个时段走在镇上的人们，都能看到街坊邻居推着电视机，一边遛弯儿一边有说有笑，利用以前花在收看官方新闻上的三十分钟来互相问候、闲聊，并一起分享站出来反抗政权的那份刺激。

“遛”电视机的做法不仅富有创意，而且具有感染力。这是一个很棒的“梗”，很快这种做法就传遍了波兰的大街小巷。波共政府感到莫名惊诧，权衡再三，却无法逮捕任何人，因为并没有法律禁止波兰公民将电视机推到街上。政权能做的就是将晚上10点的宵禁提前到了晚上7点，从而迫使每个人都呆在家里，并通过这一举动显示出它无力控制批评，

这下波兰公众更忍无可忍了。

推车抗议活动使政府感到非常棘手：对抗议者置之不理吧，只会使他们更加胆大妄为、显得政府软弱无能，并加剧抵抗；镇压抗议者吧，仅仅因为推着电视机遛街这种无伤大雅的事情就出手，这会让当局显得过于强硬和压制。通过下令提前宵禁来遏制抗议活动，这种笨拙的做法使政权丧失了公信力，扩大了批评政府的波兰公民基础，并使当局显得荒谬可笑。他们再也不能自称是从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了。这种叙事一旦被打破，他们对权力的控制就变得很脆弱，而最终政权垮台了。这一特定类型的非暴力战术即是所谓“致困行动”(dilemma-action)。它旨在为打击的对象创造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迫使对手陷入“双输”情境：无论怎样应对，都将遭受骂名，最终威信扫地。精心选择的致困行动会利用人们广泛的共识，利用不可预测性和幽默感来颠覆官方叙事，并引来广泛的公众支持。

然而，除了能当成不错的谈资讲讲之外，这种战术是否行之有效？它是否有可测的结果？我们的研究表明，“致困行动”可以使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提高11%至14%。与暴力运动相比，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已近乎两倍高(非暴力成功的几率为50%，暴力运动成功率仅为29%)。而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致困行动”可以进一步增加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使其几率接近三分之二(64%)。

研究表明，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非暴力性社会抗议一直是通向民主最可靠的途径。¹尽管最近出现了民主的倒退，但持续的非暴力动员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民主存续之路，尤其是在新的民主国家。²

当然，非暴力动员运动也可能失败。自1905年以来，它们的完全成功率为47%(占320个案例中的150个)。在1974年以来的、更晚近的所有案例中，即从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失败率(定义为任何不完全成功的情况)为53%(占258个案例中的137个)。在2010年后，公民抗争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普及水平”，但其有效性开始下降。³

我们知道，非暴力群众运动比暴力运动要有效得多，但为什么有时非暴力运动会失败呢？这是否跟他们的战术有关系？非暴力本身是一种广泛的战术，但仅仅说一场运动是非暴力的，并不足以说明它实际上是如何追求其目标的(当然，除了避免使用暴力)。例如，同为非暴力运动，但着重于抗议的运动与那些更具破坏性的直接行动(如罢工)的运动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有关特定非暴力战术有效性的研究相当有限。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几个案例之间的比较上，或研究运动内部的战术变化。除了有人建议运动使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或许可以更加有效之外，对于特定类型的战术及其对运动成功所起的作用，相关研究寥寥无几。

话虽如此，人们对评估创造性战术的影响越发有兴趣。通过借鉴一些个人轶事，诸如史蒂夫·克劳肖(Steve Crawshaw)的《街头精神：抗议与恶作剧的力量》，或各类活动家培训指南，如安德鲁·博伊德(Andrew Boyd)和戴夫·奥斯瓦尔德·米切尔(Dave Oswald Mitchell)的《美丽的麻烦：革命工具包》，或由“应用非暴力行动与战略中心”(CANVAS)出版的《有效非暴力斗争指南》，史蒂文·邓科姆(Steven Duncombe)和西拉斯·哈雷拜(Silas Harrebye)提供了有关创意活动与传统活动形式有效性的对比数据。⁴他们发现，在几乎所有量化指标上——兴趣观察、请愿签名的收集数量、传单

分发的速度和规模、对活动人士的反应等方面——创意活动在实现意愿目标方面都胜过传统方法。

我们的研究旨在为这些贡献添砖加瓦，对致困行动的功效进行介绍、概念化并加以量化分析。然后，我们使用非暴力运动中致困行动的全球数据，评估这一战术对运动成败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致困行动可靠地促进了运动的成功。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一战术如此有效呢？

致困的力量

在对印度进行殖民占领期间，英国当局垄断控制着日常必需品——食盐，开征盐税并控制食盐的生产和分配，着眼点是食盐的出口价值。独立运动本可以对这种状况愤起抗议，但却选择了更具创意的做法。在甘地的领导下，独立运动人士们奔赴海岸，蒸发海水自制盐巴。抗税和不服从行动很快在印度蔓延，并影响了盐业以外的许多事物。

英国当局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他们可以坐视自己失去对食盐(及其他方面)的管控，也可以镇压抗税行为。他们选择了后者，逮捕了数千人，在此过程中损害了殖民政权的合法性，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令独立运动如虎添翼。

甘地关于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独特思想开始声名远播，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善于设计创意性致困行动的大师，用致困行动让对手进退两难从而促进他的事业。

我们记录了历史上世界各地的致困行动案例，但对它们下功夫进行系统研究是最近才开始的。乔治·莱基(George Lakey)是第一位将致困行动的成功经验撰写成篇的活动家，他在1987年描述了他所称的“致困示威”。加拿大活动家菲利普·杜阿梅尔(Philippe Duhamel)读了莱基写的文章，于2001年设计了一次“致困示威”，旨在抗议加拿大政府参与美洲自由贸易协会(Free Trade Association of the Americas)。抗议者手持一把“巨型钥匙”，在渥太华国际贸易和外交事务部展开了一次“搜查和扣押行动”，他们要求该部门允许他们查阅贸易条约草案。抗议者被逮捕，从而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为什么加拿大政府拒绝公布草案？为什么要保密？一周后，抗议者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草案被公之于众。杜阿梅尔后来就此事的来龙去脉发表了一份详细的战术说明。⁵

在莱基和杜阿梅尔看来，这一战术的核心是两难困境，即通过一种直接行动战术，迫使对手面临一个双输的抉择。与所有直接行动一样，致困行动是在传统的倡导活动之外起作用的。它们旨在让目标做出回应。典型的抉择是在对活动人士的取态上：镇压吧，显得过于粗暴；不作为吧，又显得太软弱了。在这两种情况下，目标都会失去公信力，而运动则会备受鼓舞。

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在塞尔维亚的奥托波尔(塞尔维亚语Otpor，意思是“抵抗”)运动中，人们给一只油桶贴上了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画像，然后将油桶放在一个熙熙攘攘的购物区。路人只需往油桶里投个硬币，就可以用棒球的棒槌打米洛舍维奇的脸。活动人士称之为“投币换取变革”，他们促使观众们认识到，在他们所生活的政权之下，政府更关心的是维护独裁者形象，而不是让人们和平地表达自我。警察闻讯赶到

后，不得不决定是否采取行动。他们选择“逮捕”油桶，这提供了绝佳的拍照机会，使警方——连带着米洛舍维奇——显得荒唐可笑。奥托波尔运动本可以走传统的抗议路线，却凭着一个有趣、引人注目的致困行动引起了公众对政权镇压的更大关注，并为反对政权而进行的非暴力运动赢得了支持。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致困行动的定义(它是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应用中心的培训经验基础上建立的)，要求活动人士要借助被广泛认同的信念。以“投币换取变革”的致困行动为例，它所突显的信念是：人们应该能够和平地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当警察出手打压时，人们对镇压的反弹使奥托波尔运动变得更加合法，而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合法性则大打折扣。通过将和平行动与借助广泛抱持的信念相结合，活动人士更有机会获得广大公众对其目标的广泛同情，并实现艾丽卡·切诺威丝(Erica Chenoweth)所指出的对运动成功至关重要的“大规模多样化参与”。⁶

成为好的致困行动的第三要素是充满幽默感的反讽。幽默是针对威权政权的活动人士的有力工具。戏谑行动主义(laughtivism)被定义为“被社会非暴力运动战略性使用的幽默和嘲弄，用以削弱对手的权威、建立自身信誉、打破恐惧和冷漠，并触及目标受众”。⁷玛伊肯·茱尔·索伦森(Majken Jul Sørensen)指出，政治活动中的幽默远非仅仅是“发泄情绪”。⁸她的研究表明，使用幽默手段还有助于活动人士本身，他们报告说，在参与带有幽默元素的行动时，所感受到的恐惧相对较少。

当然，并非所有噱头都具有讽刺意味。活动人士扮相滑稽可能很逗趣，但

并不一定就具有讽刺性。相比之下，致困行动就需要讽刺。它们作为情景讽刺的关键在于，揭露对手口口声声自己是从公众最大利益出发，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如比尔·莫耶(Bill Moyer)所述，掌权的人编造了一些神话，以此为他们自私的政策和计划辩护。⁹压迫性的政府并不需要公民真的相信这些神话，但他们需要公民在公共场合中“如同”相信这些神话。¹⁰其内在的讽刺性在于，掌权者的公共叙事掩盖了他们实际上的真相。

活动人士的目标是利用创意性战术，揭示那些被当成真人真事呈现给公众的神话、揭示其背后的真相——同样重要的是，让公民们置身于颠覆那些神话的公共行为之中

因此，活动家的目标是利用有创意的战术，揭示那些被当作真人真事呈现给公众的神话背后的真相——同样重要的是，让公民置身于颠覆那些神话的公共行为之中。例如，如果一个政权不允许人们公开表示抗议，那么致困行动就会通过展示无字标语、举行无声抗议或用玩具代替人们进行抗议，以讽刺性的方式引起关注。因此，致困行动是一种公众的不服从

形式，它破坏政权的叙事，但又以一种尊重广泛抱持的社会规范的方式进行。其结果是，公开展示了政权叙事何其违背社会规范。

政府可能会说发动战争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安全，但实际上战争使公民面临更大的风险。抗议者可以选择传统的示威方式走上街头，也可以创造性地试试具有讽刺意味的致困行动：将反战信息写在钞票上、穿着骷髅装在墓地抗议，或者举着白纸静默地控诉。¹¹

对一群进行和平行动的创意活动人士实施逮捕将损害政权的声誉。这个结果非常重要，因为影响运动成败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公众对活动人士的看

法。当他们被视为扰乱秩序、令人讨厌或是极端主义时，他们往往无法吸引新成员。¹²相比之下，研究表明，如果当局对付活动人士的方式令公众感到道义上的愤怒，那么公众对该运动的支持就会上升。¹³具有讽刺性元素的行动可以非常有效地将活动人士描绘成富有同情心的形象，并将他们的对手描绘得充满敌意。

尽管我们研究的各种致困行动在富有玩味性或滑稽性的程度上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努力利用创意的讽刺来揭示专制权力内在的荒诞。

致困行动研究

这个项目最初的目标是将几十年的活动经验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斯尔杰·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深知，致困行动可以带来改变，并以其亲身经历印证了这一点。他是奥托波尔运动的领导人，在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上功不可没。他后来又在“应用非暴力行动与战略中心”工作多年，从事对全球活动人士的培训。为了将经验付诸实践，我们对44个致困行动案例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对九种不同的成功指标进行编码。这构成了我们2020年的著作《恶作剧者vs.独裁者》(Pranksters vs. Autocrats)的基础。¹⁴其结果令人鼓舞，也促使了眼下这个研究的开展，它旨在记录非暴力运动运用致困行动的范围，并检验它们是否影响成功率。

为了检验作为非暴力运动的一部分的致困行动的有效性，我们研究了发生在1905年至2019年间的320个非暴力运动中的致困行动战术。这些运动被纳入更宏大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及其结果”(Nonviolent and Violent Campaigns and Outcomes, NAVCO)1.3数据集，该数据集涵盖了从1905年

到2019年时期。¹⁵NAVCO 1.3中的非暴力运动提供了一个样本，我们可以对其中是否存在致困行动进行编码，从而比较具有和不具有致困行动的运动的成功率。

编码的第一步是了解每个运动使用的战术范围，并寻找致困行动的标志。这些标志的例子包括抵制、绝食抗议、媒体艺术、罢工、静坐示威和各种象征物。如果我们发现了致困行动，我们就会对其描述性和评价性特征进行编码。如果我们的团队在一个运动中找到了致困行动战术的一个范例，那么对这场运动的搜索就会到此为止——因为一个范例就足以用来比较，没有必要找到它运用致困行动的所有例子。如果在第一次查找中没有发现致困行动的证据，我们团队就会再次查看主要和次要资料，以确认一项运动中确无致困行动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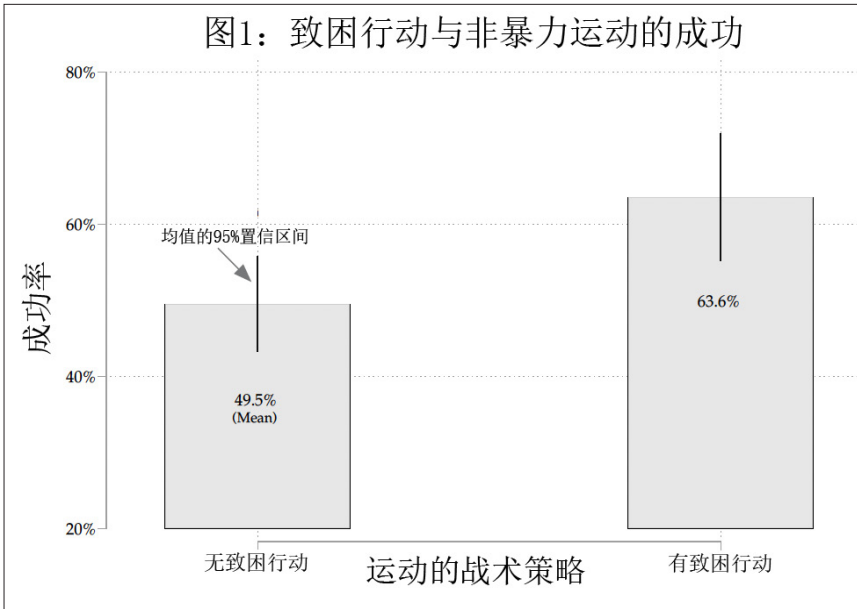
举个例子说明编码的过程：2009年1月，冰岛的所谓“厨具革命”(Cutlery Revolution)期间，近两千人聚集在议会大厦外，敲打着平底锅和其他厨具。这种使用日常厨房用品的方式既有助益又具有讽刺意味，突显了政府处理大规模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的方式对普通民众养家糊口能力的影响。敲打锅碗瓢盆还制造了很大的噪音，吸引了媒体的注意。

示威者呼吁总理盖尔·哈尔德(Geir Haarde)及其内阁辞职，并要求进行改革，使政府更加透明。这种扰乱行动迫使政府要么将抗议者视为罪犯——并因此而可能面临过度反应的指控——要么让喧闹的示威继续下去。示威者实现了他们的短期目标：哈尔德、中央银行行长和该国最高金融监督官员全部下台。当年四月进行了提前选举。为了对这个案例进行编码，我们团队的两名成员独立查阅了五个不同的二手资料来源，包括报纸文摘、百

科全书条目、同行评审的期刊文章以及现存的一个非暴力动员数据库。

冰岛的厨具革命只是一个例子。总体而言，我们的数据表明，仅有约三分之一的非暴力运动中存在致困行动，但其发生率在不同时间相当稳定，这表明致困行动的存在并不是新现象。致困行动也发生在非暴力运动之外，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大规模动员的尝试——无论是否使用致困行动——从未吸引到上千规模的参与者，因而无法达到NAVCO数据集的门槛。为了克服数据的这一限制，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其中包括了超过四百个致困行动案例，其中不乏与任何较大型运动无关的一次性事件，更不用说有上千名参与者的运动了。例如，我们收录了2013年5月土耳其安卡拉的“地铁接吻”抗议活动，此次活动的发生源于公共交通官员查看车站的安全摄像画面，发现有一对情侣在接吻。上百民众于是涌入车站，不顾官方关于不得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秀恩爱的告诫，在数分钟内进行了接吻快闪，一些人还举着写有“免费接吻”的牌子。官员随后不得不做出抉择：是将接吻定为违法行为，还是让这些抗议者挑衅当局的权威。在NAVCO数据中找到的致困行动数据约占我们迄今研究案例的四分之一。

图1：致困行动与非暴力运动的成功



注意：这里将部分的成功视为50%，失败视为0%，完全成功视为100%。

证据

在NAVCO 1.3数据集里，所有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大约为54%。图1中的左图显示，这个平均值因是否采用致困行动而有很大的变化。没有采取致困行动的非暴力运动，其整体成功率略低于50%，而采用致困行动的非暴力运动平均成功率为64%。

接下来，我们测试了致困行动的效果。¹⁶我们的估算表明，致困行动关乎运动成功的概率能增加10个百分点。这比之前的14个百分点的估计值(64%

对 50% 的成功率)要低, 但我们的估算是基于一种通常对离群观测结果不太敏感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表明, 平均而言, 致困行动显著提高了非暴力运动成功的可能性。

然而, 在过去的30年里, 成功率的差距缩小了, 与此同时, 非暴力运动的整体成功率也有所下降。这两个趋势——致困行动带来的差异越来越小, 以及整体上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越来越低——似乎都是自冷战结束开始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 包括1920年-1950年的年份, 我们可以看到, 含有致困行动的运动的成功率大大超过了没有它的运动。然而, 自冷战结束以来的30多年里, 这一差距在缩小。具体来说, 从1905年到1988年间, 这一差距为25个百分点, 而从1989年以来, 这一差距缩小到9个百分点: 从1989年到2019年, 在至少含有一个致困行动的非暴力运动成功的案例中, 运动成功率为61%, 而没有致困行动的运动成功率为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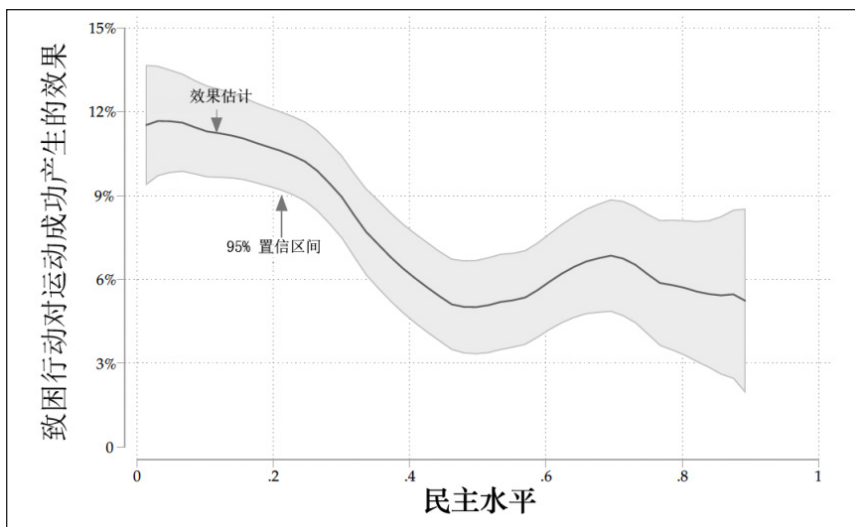


图2: 致困行动提升专制政体中的非暴力运动成功率

来源：Varieties of Democracy项目(V-Dem)的民主数据(x轴)。

这种成功差距缩小的原因何在？难道致困行动对冷战结束前更为普遍的那种全面专制政权更具有影响吗？那种政权从定义上来说，更为远离被统治者的同意，因此在致困行动可以利用的起点上就存在较大的合法性差距。为了探讨这种可能性，我们在图2中根据目标政府的民主程度，绘制出致困行动边际效应的估值。

图中的曲线显示，致困行动的边际效应在更加专制的国家中最高。当运动针对的是最专制的政府(其民主程度介于0到0.2之间)时，致困行动的效应远高于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在民主程度最高的政府(民主数据得分超过0.6)中，致困行动的效应仅有专制政权的一半左右。简而言之，当非暴力运动针对的是更专制的政府时，与在更民主的环境中采用致困行动相比，致困行动提高运动成功率的可能性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致困行动如何助益非暴力运动

我们的团队就每个致困行动案例收集了一系列描述性数据，编码了15个不同的指标，其中有些是描述性的，有些是评价性的。我们的评估结果表明，致困行动有四个具体要素左右着非暴力运动的成功：促成群组的形成、贬低对手的合法性、减少恐惧以及引起媒体的同情报道。

群体的形成(group formation)：波波维奇认为，一场成功的运动能够利用他所称的“酷炫因素”(cool factor)。在致困行动如何塑造公众对运动的看法、如何鼓舞直接参与者的士气方面，他的经验得到了这些相关研究的支

持。例如，这些行动可以将活动人士呈现为无威胁性的。¹⁷有关幽默和行动主义的研究进一步表明，采取诙谐幽默的方式可以降低观众对活动人士信息的抵触情绪，并可以诱导观众思考他们可能一直回避的问题。¹⁸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中运用游戏可以有助于打破社会障碍，在社会不同成员之间创建新的联盟。¹⁹

致困行动不仅影响公众的看法，也会影响活动人士自身。使用讽刺幽默的方式开展致困行动会给参与者带来积极的感受。与其他非暴力战术相比，致困行动更有助于群组的形式和保持活跃。致困行动往往会引发对手的短期负面反应，但这很容易解释为战术上的成功，会让活动人士士气大振。

几乎每次(即92%的情况下)，非暴力运动进行致困行动都会导致运动参与者人数的增加。在致困行动之后，有82%的情况下，运动的动员会继续进行，而在93%的情况下，致困行动会增加公众对非暴力运动的同情。

合法性：致困行动不仅要造成对手真正的两难困境(失败的尝试通常可追溯到在这方面的失误)，而且还必须触发人们广泛持有的信念。让对手以违反规范的方式对致困行动作出回应，这是关键所在。对手无论怎样回应都是输定了的，因为致困行动决定了，要想不违反广泛认同的规范，唯一替代方案是无所作为，而不作为又会被视为示弱，因此是一种损失。

然后，困境创造了这样一种情况，即目标在公众眼中可能会失去合法性。旁观者对于针对目标的活动可能产生的价值如何评估，也可能发生改变。²⁰例如，如果对手的首选是避免公开回应困境，那么公民们可能会觉察到他们的软弱，并因此而进一步抗争。如果参与致困行动的人数不断增加，

活动人士的合法性就会得到提升，而他们的对手的合法性则会下降。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发起致困行动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针对对手的荒谬、过分、不合理或压制性的规定。如果禁止抗议，活动人士可以举起空白标语牌。而逮捕举空白标语牌的人将会使对手丧失合法性，因为公众会对对手制定的法规失去尊重。一次得当的致困行动可以将政权的叙事从合法变为非法，从公正变为不公正，从具有代表性变为专制，等等。

政权置之不理的情况很少见。我们发现，90%的情况下，致困行动会遭遇激进或暴力的回应，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反应过度的回应。例如，2011年7月，马拉维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政府。他们挥舞着该国独立之初使用的国旗——政府最近改变了国旗的设计并禁止展示旧国旗。他们穿着红色的服装，自称为“民主和平的红军”。防暴警察在几个城市进行了暴力镇压，但并没能平息抗议，抗议活动又持续了数天，并在8月和9月再次爆发。当局的严厉反应，正如我们之前提到波兰政府对推着电视遛街的过度反应一样，助长了活动人士的声势，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

恐惧：这是将致困行动与运动成功联系起来的第三个因果机制，涉及恐惧心理学。埃及讽刺作家巴斯姆·尤素夫(Bassem Youssef)写道，恐惧一直是压制性政权的“最佳武器”，但“当你发笑的时候，你就不再害怕了”。²¹他是开罗的一名心脏外科医生，因2011年初发表讽刺作品而成名，当时的“阿拉伯之春”推翻了侯赛因·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独裁政权，他在自家洗衣房拍摄视频上传到YouTube。尤素夫在互联网上累积了数百万次点击量，然后通过一个类似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的《每日秀》(Daily Show)的电视节目引起了轰动。尤素夫的节目“Al Bernameg”(这个节目)，最终吸引了三千万埃及观众(几乎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它前所未

有地公开嘲讽埃及政府，提供了以此为特色的突破性的喜剧。威权政权用恐惧来打压言论，扼杀抵抗、制造社会分歧。恐惧可以引发对风险的悲观看法、并增加规避风险的倾向，导致孤立感和冷漠情绪——这是降低参与抗议活动的两种机制。²²然而，正如尤素夫亲身体会的那样，笑声可以对抗恐惧。例如，2013年3月，当时的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政府以尤素夫涉嫌侮辱伊斯兰教和埃及国家逮捕了他，当尤素夫出庭听证时，他戴着一个巨大的帽子，这个帽子是穆尔西在同年早些时候在巴基斯坦获颁荣誉学位时戴过的。尤素夫没有被逮捕所吓倒，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嘲笑穆尔西没有应对批评的能力。

2013年7月军方政变推翻了穆尔西之后，尤素夫受到军政权进一步镇压，他于是在2014年离开了埃及。然而，讽刺节目Al Bernameg的影响力仍然延续，其他喜剧演员如沙迪·阿布·扎伊德(Shady Abu Zeid)也推出了自己的政治讽刺节目。扎伊德还在2016年通过一次致困行动将讽刺作品带到了街头，他在穆巴拉克下台五周年之际，向开罗的警察们献上了充气避孕套做的气球。抗议活动的视频显示，活动人士和公众成员面对警方时开怀大笑。²³由于笑声是一种能够促进群体形成和诉诸集体行动的乐观情绪，因此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活动工具。

致困行动可以减少活动人士和观察者的恐惧。利用笑声来对抗恐惧可以吸引更多人加入运动，并缓解活动人士过劳的问题。或许更重要的是，致困行动诱使对手做出荒谬或不合逻辑的反应，可以减少非参与者的恐惧，使他们更有可能在未来加入针对对手的抗议活动，或者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向不同的受众复制这种致困行动。

正如波波维奇和尤素夫所强调的，独裁者不喜欢笑话。独裁者往往好面子，如果受到嘲笑，就会反应过激。他们对幽默的过激反应暴露了他们膨胀的自我和脆弱的身份认同。2011年在白俄罗斯，活动人士仅仅是在公共场所鼓了鼓掌，就成功地激怒了总统阿连克谢·卢卡申科(Alyaksandr Lukashenka)的政权。当警察逮捕了其中一些人时，公众看到的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威权政府，拥有各种强制手段，暴露了它对和平抗议的恐惧。²⁴我们的定性证据表明，大多数致困行动(87%的情况)有助于减少运动参与者的恐惧或冷漠。通过减少恐惧和增加公众同情，致困行动几乎总是(88%的情况)有助于重塑对手的形象，使其变得不那么可怕或变得更具压制性。

媒体：最后，一个精心设计的致困行动将会受到媒体的关注。关键问题在于这种关注是否是正面的。研究表明，一般来说，抗议活动往往得到媒体的负面报道，抗议者被描绘成冒犯的人。²⁵媒体报道的内容会因报道机构和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而有所不同。在高度压制的国家，国际和国内的报道会有明显的差异。

在理想情况下，媒体对致困行动的报道会介绍实施行动的团体(假设该团体对公众来说是新出现的或者不熟悉的)，并记录对手的违反规范的行为。²⁶媒体报道可能会传达关于该团体的概要信息，比如其规模、组成以及与盟友或同情团体的联系等。公众认知的扩大，可能会进而导致更多的公民改变对该团体及其目标合法性的评估方式。

媒体报道对议题设置、叙事构建和铺垫效果非常关键。²⁷议题设置关注抗争所涉问题的突出性(公众是否在思考某个问题)，叙事构建(framing)关涉公众对所涉问题的看法，而铺垫效果(priming)则关涉在提及某个主题时首先涌

现在脑海中的内容。对于致困行动来说，媒体报道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足够的、恰当的报道，就无法重构叙事框架，就无法引发公众思维、从而影响人们对行动及其背后原因的看法。致困行动的嬉戏性质、讽刺手法的运用以及对广泛持有的信念的呼应，都旨在吸引同情性报道，从而重塑公众对对手的看法。在这方面，我们的发现令人鼓舞：致困行动的宗旨在84%的情况下获得了正面的媒体报道。

成功是什么模样？

切诺维斯指出，即使非暴力的公民抗争运动失败了，它们仍比暴力运动更能带来长远的变革。事实上，与暴力运动相比，非暴力运动更有可能提前五年或更短的时间引发民主过渡。²⁸我们的研究表明，采用致困行动的非暴力运动在取得这些长远结果方面可能更加有效。

2012年，苏丹的抗议者组织了“舔肘星期五” (elbow-licking Friday) 活动，以此讽刺当时的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因为巴希尔称那些希望他离职的人为“舔肘者”——那些愚蠢地希望尝试不可能之事的人。当成群的“舔肘”抗议者走上街头时，他们遭遇了橡皮子弹、催泪瓦斯、殴打和逮捕。这种激烈的镇压伴随着当局对互联网和媒体的封锁，以及总统的欲盖弥彰，他竭力声称根本没有发生过真正的起义。他的政府合法性荡然无存。虽然他还在继续掌权，但可以说，“舔肘者”为推动苏丹的民主运动做出了贡献。巴希尔最终在2019年被军事政变推翻，尽管在2021年发生了另一次政变，但该国计划在2023年举行选举并制定新宪法。在这个案例中，没有哪一方立即让步，但同样可以说，在公众心目中，寻求更好和更自由政府的事业获得了进展，而对专制者的荒谬自大的揭露则

有助于这一事业。

因此，即使被NAVCO数据集标识为失败的运动中，那些使用了致困行动的运动在重构叙事、增加活动人士吸引力以及减少活动人士自身的恐惧等关键指标上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一项积极的结果都有可能在未来有助于瓦解专制权力。一旦一个独裁者的形象被有效的致困行动毁掉，要想恢复元气是很难的。

这些效果可以在我们追踪的各种致困行动案例中看到，其中针对俄罗斯普京政权的案例，揭示了致困行动的潜在积极影响，即使它们尚未导致政权更迭。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系列俄罗斯活动人士已经采用致困行动来挑战俄罗斯专制政权的合法性。2012年，俄罗斯巴尔瑙尔(Barnaul)的活动人士绕过了严禁公开抗议禁令，设置了一组玩具，这些玩具举着小小的抗议标语。当局仿佛受到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油桶事件的启发，裁定玩具展览是一次“未经授权的活动”，然后拒绝了新的展览申请，声称玩具不能成为俄罗斯的公民。²⁹这一情况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让克里姆林宫显得荒谬可笑。在2021年，警方还因一次堆雪人抗议活动逮捕了一人。³⁰

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的创意活动人士采用了致困行动来抗议对任何提及“战争”的言论的严厉镇压。他们携带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进行无声的抗议行动，并制作了自我审查的海报，在出现“反对战争”一词的地方加上了星号。他们甚至在商品价格标签上加入了反战标语。³¹

同样地，在2022年底，中国的抗议者也违反公共集会禁令，举起了白纸，

以此回应政府实施压制性的“COVID清零”法律，这些抗争的努力导致政府决定放松限制。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抗议者也在反政府抗议活动中采取了致困行动。妇女们跳舞、摘下头巾、公开剪发，以嘲弄道德警察的权威。她们的行动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这些行为都让抗议者以嬉笑怒骂的方式揭露专制权力的荒谬之处，并将蛮横的政策重构为荒谬的行为。

这些创意策略会迫使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政权终止他们的蛮横政策吗？可能不会。但要问这些方法能损害这些政权的权威和声望吗？³²我们的研究显示，还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性让当局吃到苦果。

注释

- 1 艾丽卡·切诺威斯和玛丽亚 J. 斯蒂芬，《民间抗争为何有效：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Erica Chenoweth and Maria J.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Mauricio Rivera Celestino 和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是鲜花还是只剩下刺，没有玫瑰？非暴力运动与专制政权的过渡》（“Fresh Carnations or All Thorn, No Rose? Nonviolent Campaigns and Transitions in Autocraci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0, May 2013: 385–400.）
- 2 穆罕默德·阿里·卡迪瓦尔，《群众动员与新民主政体的持久性》（Mohammad Ali Kadivar, “Mass Mobilization and the Durability of New Democrac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3 (April 2018): 390–417.）
- 3 艾丽卡·切诺威斯，《非暴力抗争的未来》（Erica Chenoweth, “The Future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31 (July 2020): 69–84.）
- 4 史蒂文·邓科姆和西拉斯·哈雷拜，《哥本哈根实验：创意形式与传统形式活动效果测试》（Stephen Duncombe and Silas Harrebye, “The Copenhagen Experiment: Tes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reative vs. Conventional Forms of Activism,”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21, issue 6, (2022): 741–65.）
- 5 菲利普·杜阿梅尔，《两难式示威》（Philippe Duhamel, “Dilemma Demonstration P Duhamel v2,” n.d., [www.academia.edu/7263696/Dilemma Demonstration P Duhamel v2](http://www.academia.edu/7263696/Dilemma_Demonstration_P_Duhamel_v2).）
- 6 米歇尔·尼可拉斯森，《非暴力抗争已确证是强大的武器》（Michelle Nicholasen, “Nonviolent Resistance Proves Potent Weapon,” *Harvard Gazette*, 4 February 2019,

<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9/02/why-nonviolentresistance-beats-violent-force-in-effecting-social-political-change.>)

- 7 斯尔杰·波波维奇,《搞笑主义:新一代活动家将传播民主》(Srdja Popovic, “Laughtivism: The New Activists Will Spread Democracy,” *The Wired World in 2013: Annual Trend Report*, 1 November, 2012.)
- 8 玛伊肯·莱尔·索伦森,《政治活动中的幽默:创意性非暴力抗争》(Majken Jul Sørensen, *Humour in Political Activism: Creative Nonviolent Resistanc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 9 比尔·莫耶等,《实践民主:组织社会运动的MAP模型》(Bill Moyer et al., *Doing Democracy: The MAP Model for Organizing Social Movements* (Gabriola Island, B.C.: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1), 15.)
- 10 丽莎·维丁,《统治的模糊性:当代叙利亚的政治、修辞和符号》(Lisa Wedeen,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Politics, Rhetoric, and Symbols in Contemporary Syr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11 罗宾·狄克逊、玛丽·柳辛娜和娜塔莉娅·阿巴库默瓦,《异见的艺术:俄罗斯人如何抗议对乌克兰的战争》(Robyn Dixon, Mary Ilyushina, and Natalia Abbakumova, “Art of Dissent: How Russians Protest the War on Ukraine,” *Washington Post*, 7 July, 2022.
- 12 娜迪亚·巴达尔,《活动家的讽刺性影响:负面刻板印象降低社会变革影响力》(Nadia Y. Bashir et al., “The Ironic Impact of Activists: Negative Stereotypes Reduce Social Change Influ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3 (December, 2013): 614–26.)
- 13 额德姆·埃塔克和苏珊·斯多克斯,《何苦?对参与选举与抗议的再思考》(S. Erdem Aytaç and Susan C. Stokes, *Why Bother? Rethinking Participation in Elections and Prote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82.)
- 14 斯尔杰亚·波波维奇和索菲亚·麦克林恩,《恶作剧者对抗专制者:为什么两难行动促进非暴力活动》(Srdja Popovic with Sophia A. McClennen, *Pranksters vs. Autocrats: Why Dilemma Actions Advance Nonviolent Activ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 15 艾丽卡·切诺威斯和克里斯托弗·威利·谢,《NAVCO 运动清单》(Erica Chenoweth and Christopher Wiley Shay, “List of Campaigns in NAVCO 1.3,” 2020, <https://doi.org/10.7910/DVN/ON9XND>.)
- 16 我们使用了核正则化最小二乘法 (KRLS) 估算器,同时校正了非线性时间趋势和目标政体的岁数。有关这种统计分析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彦斯·海恩穆勒和查德·哈孜里特的文章《核正则化最小二乘法:用灵活且可解读的机器学习方法减少规格误差偏差》,发表在《政治分析》杂志(2014年春季)第22卷第143-68页((Jens Hainmueller and Chad Hazlett, “Kernel Regularized Least Squares: Reducing Misspecification Bias with a Flexible and Interpretable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Po-*

- litical Analysis*, 22, (Spring 2014): 143–68) ; 有关我们的实证和稳健性测试以及更多信息, 请参阅索菲亚·麦克林恩、斯尔杰和约瑟夫·赖特的文章《两难行动促进了非暴力运动的成功》(Sophia McClennen, Srdja Popovic, and Joseph Wright, “Dilemma Actions Boost Nonviolent Campaign Success,” December 2022, <https://canvasopedia.org/wp-content/uploads/2022/11/Dilemma-Actions-Boost-Nonviolent-Campaign-Success.pdf>.)
- 17 玛伊肯·莱尔·索伦森和约恩·约翰森, 《非暴力冲突升级》(Majken Jul Sørensen and Jørgen Johansen, “Nonviolent Conflict Escalation,” *Conflict Resolution Quarterly* 34 (Fall 2016): 85–88.)
- 18 卡迪·般若姆·查图和劳伦·菲尔德曼, 《喜剧演员和活动家走进酒吧: 喜剧在社会正义中的重要作用》(Caty Borum Chattoo and Lauren Feldman, *A Comedian and an Activist Walk into a Bar: The Serious Role of Comedy in Social Justice*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0), 41.)
- 19 同上, 第 48 页。
- 20 例如苏珊·洛曼, 《信息瀑布的活力: 1989 年至 1991 年东德莱比锡的星期一示威活动》(Susanne Lohmann, “The Dynamics of Informational Cascades: The Monday Demonstrations in Leipzig, East Germany, 1989–91,” *World Politics*, 47 (October 1994): 42–101.)
- 21 巴斯姆·尤素夫, 《革命入门: 笑傲阿拉伯之春》(Bassem Youssef, *Revolution for Dummies: Laughing Through the Arab Spring*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7), 272.)
- 22 艾瑞克·约翰逊和阿莫斯·特沃斯基, 《情感、概括和风险感知》(Eric J. Johnson and Amos Tversky, “Affect, Generaliz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Ris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 (July 1983): 20–31) ; 珍妮佛·勒纳尔和达彻尔·柯尔纳特, 《惧怕、愤怒和风险》(Jennifer S. Lerner and Dacher Keltner, “Fear, Anger, and Ris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 (July 2001): 146–59) ; 詹姆斯·祝阿克曼和罗斯·麦克德莫特, 《情绪以及风险选择的构架》(James N. Druckman and Rose McDermott, “Emotion and the Framing of Risky Choice,” *Political Behavior*, 30 (September 2008): 297–321.)
- 23 《阿布扎伊德拒绝为避孕套恶作剧道歉, 预计会被逮捕》(“Abuzaid Refuses to Apologize for Condom Prank, Expects Arrest,” *Egypt Independent*, 28 January, 2016,) www.egyptindependent.com/abuzaid-refuses-apologize-condom-prank-expects-arrest.
- 24 《白俄罗斯: 寂静的抗议令政权感到恐惧》(“Belarus: Silent Protests Frighten Regime,” BBC, 30 June, 2011, www.bbc.com/news/world-europe-13975788.)
- 25 丹妮尔·布朗和萨默尔·哈尔娄, 《抗议、媒体报道和社会斗争的等级结构》(Danielle K. Brown and Summer Harlow, “Protests, Media Coverage, and a Hierarchy of Social Strugg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4 (October 2019): 508–30.)
- 26 玛格丽特·坦卡尔德和伊丽莎白·列维·帕拉克, 《规范认知作为社会变革的载体》(Margaret E. Tankard and Elizabeth Levy Paluck, “Norm Perception as a Vehicle for Social Change,”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 10 (January 2016): 181–211.)

- 27 迪特兰姆·舍费勒和大卫·图克斯伯里,《构架、议程设置及启动:三种媒体效应模型的演变》(Dietram A. Scheufele and David Tewksbury, "Framing, Agenda Setting, and Priming: The Evolution of Three Media Effects Model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 (March 2007): 9-20.)
- 28 尼可拉森,《非暴力抗争已确证是强大的武器》(Nicholasen, "Nonviolent Resistance Proves Potent Weapon.")
- 29 凯文·奥福林,《官方裁决:玩具无法举行抗议活动,因为它们不是俄罗斯公民》(Kevin O'Flynn, "Toys Cannot Hold Protests Because They Are Not Citizens of Russia, Officials Rule," *Guardian*, 15 February, 2012.)
- 30 布仁丹克尔,《因雪人集会反普京被捕的俄罗斯女子毅然重复抗议行动》(Brendan Cole, "Russia Woman Arrested for Anti-Putin Snowman Rally Defiantly Repeats Her Protest," *Newsweek*, 29 January, 2021.)
- 31 《一名俄罗斯女子因将商店价签更换为反战信息而被监禁》("A Russian Woman Is Jailed for Replacing Store Price Tags with Anti-War Messages," *NPR*, 14 April, 2022.)
- 32 提摩西·福瑞等,《普京的受欢迎度是否真实?》(Timothy Frye et al., "Is Putin's Popularity Real?" *Post-Soviet Affairs*, 33, issue 1 (2017): 1-15.)